

胡绳武著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

四川教育出版社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

胡绳武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蔡济生

封面设计：文小牛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

胡绳武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125 插页 1 字数 50 千

1984 年 9 月第一版

198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500 册

书号：2344·1

定价：0.40 元

2625/09

1

人们创造历史，但是他们往往在经历了很长的时期以后，还很难对自己的历史加以科学解释。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这样。因为在人们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尽管各个人都抱有各自的目的，但这些目的，大部分都是相互冲突的，相互冲突的意向使他们得到的常常不是所希望的。这种冲突有时使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结局离奇的暴力行为的戏剧一幕接连着一幕搬上舞台。因此，在整个历史领域中，人们通常看到的总是偶然性在起作用。历史似乎是不服从人们控制的、时而进步、时而退步、变化莫测、互相冲突的一堆混乱的事实。面对着一堆混乱的事实，而无力予以科学的说明，也就只好有意或无意地把历史事件的最终原因，归之于天意或归之于英雄人物的意志。这样，就规定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从遥远的古代起就是唯心

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之所以长期以来统治着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①

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最原始观点，乃是一种把一切历史事件的原因都归结为天意，把整个人类历史运动解释成是神的意志所表现的神学的历史观。

在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就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上天的意旨。《诗经·商颂》中所说的“帝立子生商”，就是这种历史观的表述。

商代以来的这种天命的历史观，随着历史的发展，曾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发展。春秋时的孔子就把天作为一种有人格、有意志，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最高主宰者来看待。他把认为无法讲通的、高远莫测的、无可奈何的事情，都归结为天或天命。战国时的孟子则明白地提出了天命循环的历史观。他把历史看成是天命的永远一治一乱的循环，认为社会的治乱归根到底决定于有无承受天命的圣人出现。所谓“天下之失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这种天命循环论的历史观的表述。这种历史观后来由邹衍把它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2页。

和阴阳五行说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五德终始”说。到了西汉前期，封建主义的思想家董仲舒又进一步修正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提出了所谓“三统”循环、帝王继统的历史观，和“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式。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说，作为封建主义统治秩序“三纲”、“五常”的道是上天规定的。天是不变的，因此，出自天的“道”也是万古常存永恒不变的。至于改朝换代只不过是补救旧的统治者对于“道”的过失，重新恢复“道”的权威。

这种天命的历史观，往往美化古代甚至把历史看成是倒退的，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三代之世，未来最大的希望就是回到那个时代去。如孔子为了维护旧制度就竭力美化古代西周的历史，把西周的制度说成是最完美的制度，表示自己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恢复西周的制度，他自己最崇拜的人物就是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周公。孟子也同样极力美化古代社会，言必称尧舜。秦汉以后，美化古代历史的思想家几乎每代都有。有些唯心主义的思想家，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鲍敬言、北宋的邵雍、南宋的朱熹等竟干脆明白地宣称历史是倒退的，今不如古。

从商周以来就开始出现的天命的历史观，由于它

符合剥削阶级的利益，所以曾经长期地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拥护。董仲舒以后的历代的封建思想家们，他们对历史的解释尽管在具体问题上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他们多是把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看成是万古不变的，历史永远是一治一乱的循环，每逢乱世就期待有天生的圣人出来重新整顿社会秩序，使之走向稳定。

与这种天命复古主义的历史观相对立，从春秋战国以来，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了不少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反对用天命来解释历史，认为社会的治乱不是决定于天命而是决定于人事。他们看出社会物质生活的不断进步，原始人的简朴生活不应成为后人的理想；他们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时代变了，制度也必须相应地随着改变；他们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春秋时的管仲，战国时的荀子、韩非，西汉时的陆贾、司马迁，东汉时的王充、仲长统，魏晋南北朝的范缜，唐代的刘知几、柳宗元、刘禹锡，南宋时的陈亮，明代的王廷相，明末清初的王船山等人，就是这样的一些思想家。但是，这些在解释社会历史某些问题上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们，他们的社会历史观从整体上来说，依然是唯心主义的。他们虽然反对把社会

的治乱归之于天命，但是，他们却不能不把治乱的最終原因仍然归之于有无圣君贤相的出现；他们虽然看出了社会历史的不断进步，但却看不出社会的发展有质的变化。因此，他们往往仍然跳不出历史循环论的圈子。

在西方，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最初也是一种神学的天命的历史观。希腊的大史学家希罗多德就把上帝看成是人世间一切事物的最高主宰者。认为上帝是历史的主人，上帝所持的命数则是历史的原则。国家的兴衰，生命的存亡，都是上帝决定的。与希罗多德差不多同时的另一希腊的大史学家修昔底斯的历史观点，虽然较希罗多德前进了一步，注意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和经济因素对历史的作用，但他依然不能摆脱天命史观的影响。他信仰命运，认为有些历史事件是由命运决定的，认为这些事件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罗马的历史学家亦同样不能摆脱这种天命史观的支配。如塔西佗，他虽然不把历史运动的原因直接归之于天命，而是归之于人的意志，特别是皇帝的意志。但是，在他的著作中仍然描写天道的运行、善恶的因果怎样在历史上显现出来。

历史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的思想成为统治的思想，于是用基督教的神学原理来解释历史，就成为

中世纪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公元四世纪时，希波（现在的阿尔及尔）的主教圣奥古斯丁，在他的《神之都》一书中，坚持用基督教的神学原理来全面地解释历史，第一次系统地建立起神学的历史哲学。自此以后，这种历史哲学在欧洲统治了一千多年。在奥古斯丁看来，一切历史事件都是上帝决定的。奥古斯丁把罗马帝国的出现，康士坦丁帝的兴起，历史上的一切战争都视为上帝意志的表现。继奥古斯丁之后，另一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哲学家博胥埃，虽然不象奥古斯丁那样把一切历史事件都直接归之于上帝，认为在通常一般的情况下，每一时期的历史变革都决定于前一时期所形成的原因。但却认为有些历史事件，即所谓历史遗迹，是由上帝直接决定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逐渐形成，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统治，猛烈地批判了封建主义支柱的基督教思想，从而也就反对用基督教的神学观点来解释历史。他们力图用事件的自然原因来说明历史现象，并且开始探求历史运动的动力及其规律。因此，自从十八世纪以来，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就有了迅速的发展。应该承认，自从十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上，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极有价

值的观点，并且突出了要科学地解释社会历史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历史观依然是唯心主义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人类的历史作出科学的说明。

被称为历史哲学之父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首先提出了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他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或粗野的状态出发，总是要到达文明。”^①但是维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当他对具体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时就陷入循环论的泥坑中。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等，曾有力地批判了中世纪以来的基督教的神学的历史观。伏尔泰等提出了以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思想来代替神的意志控制人类命运的思想；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成是从原始状态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但是，他们却把这种过程唯心主义地看成是人类的精神或理性不断发展的过程，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归结为理性的完善和发展，提出“意见支配世界”的论点。和启蒙学者同时代的法国唯物论哲学家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彻底地发挥了感觉论的观点，提出了人及其一切

^① 维科：《新科学》，转引自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1页。

观点和感觉都是环境造成的，即“环境决定意见”这一著名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当他们没有能力科学地说明环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时候，就又被迫不得不退回到启蒙学者的“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上去。这两个观点是直接对立的：（一）人及其一切思想和感觉是环境的产物；（二）环境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意见”的产物。显然，要从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中解脱出来，就必须寻找那种既决定环境（社会关系）又决定“意见”发展的因素。十八世纪给十九世纪历史哲学留下的任务正是发现这个因素。

十九世纪初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米涅、基佐等人的历史观点，较之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早在1802年，圣西门在他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中，就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圣西门把十五世纪以来的西欧史看成是贵族和厂主（十八世纪称之为第三等级）这两大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史，认为法国革命只不过是多少世纪以来贵族和厂主之间伟大斗争的一个插曲。他认为这两大力量之间斗争的根源是生产的发展。他说，在十五世纪以前，社会生产最主要的部门是农业，当时领导农

业生产的是贵族，因此，世俗权力就集中在贵族手里。后来，工业生产发展了，领导工业生产的厂主就逐渐获得了大大超过贵族的社会力量。这样，就形成了贵族和厂主长期以来争夺统治的斗争。圣西门的这些观点，无疑都是极为重要的观点。但是，圣西门的这些观点是和历史唯心主义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他虽然看出了阶级斗争，但却害怕阶级斗争，幻想以阶级调和来熄灭阶级斗争；他虽然看出了生产的巨大意义，但却给生产以唯心主义的解释。他认为生产的发展决定于劳动工具的发展，而工具则是由人发明的。因此，生产的发展，首先是人们智慧发展的结果。这样，他就把智慧（即思想）的发展看成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原因，实际上，也就又回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意见支配世界”的观点上来了。

圣西门的历史观点给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以巨大的影响。梯叶里、米涅、基佐等都把十五世纪以来的欧洲史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看出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看出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社会政治生活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而社会制度是由所有制状况，即财产关系，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公民生活”决定的。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说明社会上的财产关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他们试图用“人的天性”、“征服”和“暴力的掠夺”来说明问题。这样，他们也就和其他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一样，最后，仍然把历史的运动的最终原因归之于思想，认为人们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原因。

德国的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这方面似乎有其高明之处。黑格尔不仅用辩证法的观点来考察一切历史现象，从而克服了过去历史哲学中一切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且不满足于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解释历史，认为必须探讨各种社会现象的共同基础。他认为历史人物所标榜的动力后面还有别的动力，这种动力是应该加以研究的。但他却把这种动力归之于“绝对精神”，认为人类全部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表述和实现。他并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思想体系中把这种动力输入到历史中去。因此，如果说十八世纪以来，法国的先进思想家们把历史运动的最终原因归之于思想，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深渊的话，那末，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则陷入于客观唯心主义的泥坑中。

由此可见，所有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不管他们在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上提出了怎样有价值的观点，他们终于都不能对历史加以科学的说明。

把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统治下彻底地解放出来，并对历史的发展加以科学解释的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来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客观的规律，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给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唯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十九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能够改造现实的伟大力量。从三十年代开始，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起义，1836年到1848年英国的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的暴动，都是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历史力量而行动的初次表现。无产阶级为了自己和全人类

的彻底解放，迫切地要求科学地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以这种预见为基础，科学地制定革命的纲领以及战略和策略。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诞生，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实践迫切要求的产物。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它的革命目标是消灭一切剥削形式，而不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它是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最彻底的表达者，它对未来根本无所恐惧；它能够摆脱一切剥削阶级的偏见，敢于彻底地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无产阶级是一个用自己的劳动和革命活动来直接参加自然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阶级，它的阶级特点决定了它能够正确地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样，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诞生就具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机器生产密切联系着的。在这以前，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还被各种各样宗法的、宗教的以及其他种种外壳掩盖着。这种状况，决定了人们去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规律几乎是不可能的。大机器生产则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状况。因为大机器生产，不仅给人们一种支配自然的巨大的能力，而且建立了生产劳动的社

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使阶级关系日益简单化、明朗化，使社会发展的经济根源明显地暴露出来。而且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塞状态，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有可能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其共同性、重复性，从其中找出一般的规律来。恩格斯在论述引起他自己和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最初认识的那个历史条件时说：“在以前各个时期，历史动因和其后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所以要研究这些动因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现在这种联系已经简单化了，谜语终于有可能解答了。自从采用大工业的时候起，即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的时候起，在英国谁都知道，两个阶级，即占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夺取统治权的意向，曾经是该国全部政治斗争的重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族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使人们意识到了。……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都被认为是争取政治权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如此简单化，只有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推动整个近代史，至少是上述两个先进国家近代史的动力。但是，这些阶级斗争是怎样发生的呢？骤看起来，把从前大规模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

少较近的)归于政治的原因,归于暴力的掠夺,可是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却不可思议了。十分明显,这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纯粹经济原因决定的。同样明显的,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①这就是说,由于大工业生产所引起社会阶级关系的简单化和明朗化,已经使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看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看出社会领域中的一切斗争都是在生产中占有不同地位的集团、阶级为争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要科学地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及其规律性已经成为可能了。

同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还与当时整个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密切联系着的,是直接 从 1842 年到 1845 年德国哲学革命中诞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顾这一时期德国领域中的斗争时说:“这场革命,法国革命同它比起来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0—41 页。